

两个人的对话，一代人的心声

「剪不断」饭桌旁的家庭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天桥打场子的」
当农民不用政审「歌唱动荡的青春」
工农兵学员「潘晓」式的困惑 不该忘却

叶维丽 马笑冬◎口述
叶维丽◎撰稿

动荡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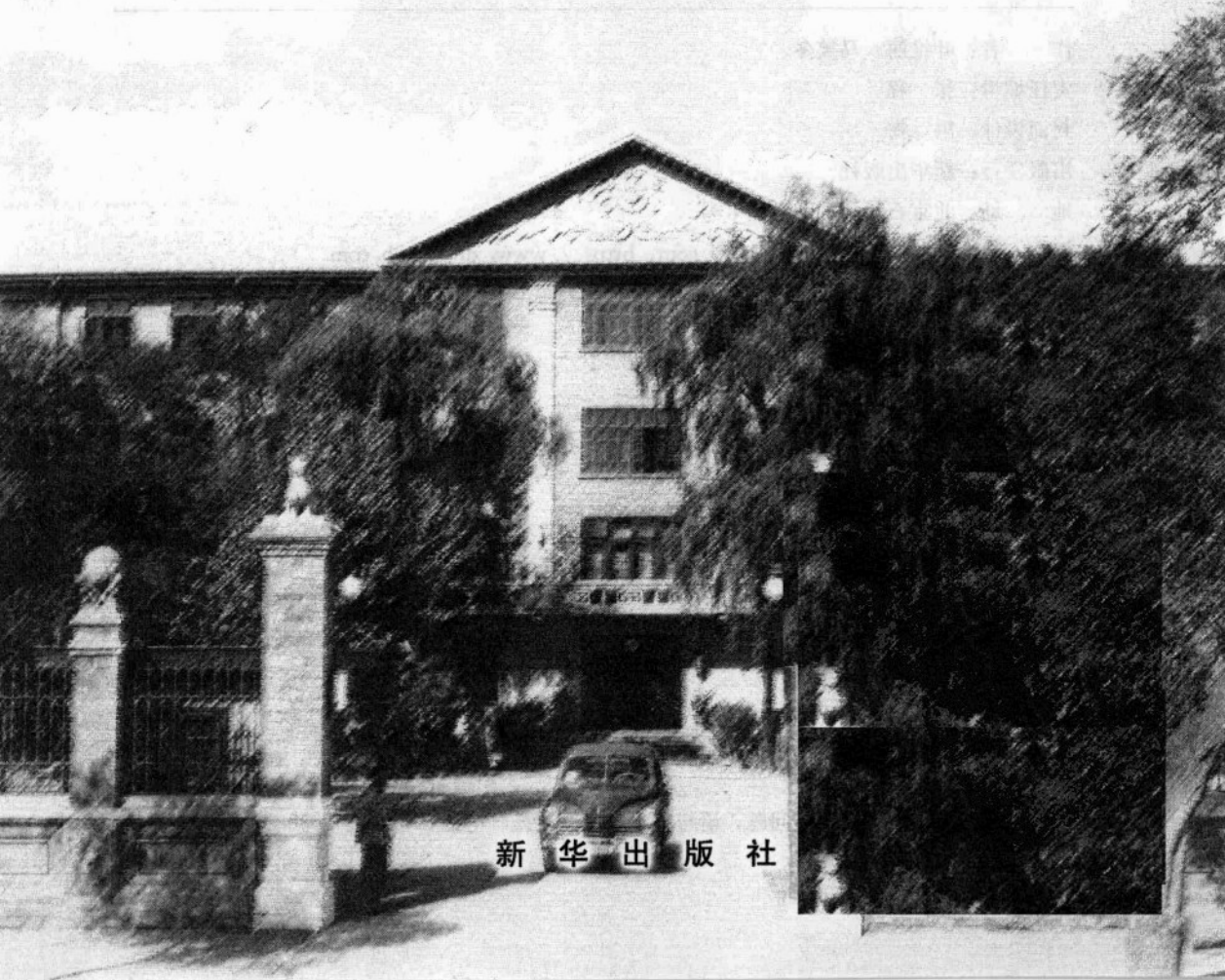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新华出版社

动荡的青春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马笑冬◎口述 叶维丽◎撰稿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 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11-8467-5

I. 动… II. ①马…②叶…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2383 号

动荡的青春

作 者：叶维丽 马笑冬

责任编辑：张 程

封面设计：冯 锴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467-5

定 价：3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剪不断	(7)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10)
“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马笑冬的家庭	(23)
第二章:“祖国的花朵”	(29)
“整托”	(31)
饭桌旁的家庭	(37)
“革命的贤妻良母”:马笑冬的回忆	(38)
“做女人,要争气”:叶维丽的回忆	(43)
马阿姨和仇大娘	(49)
大院	(52)
新华社大院	(52)
商业部宿舍大院	(58)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61)
“困难时期”	(70)
政治阴影	(73)
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	(79)
“革命化运动”	(82)
“文化大革命”	(99)
“这么解放”	(100)

“死了就死了”.....	(107)
“破四旧”.....	(122)
文革中的家庭.....	(128)
大串联.....	(138)
“天桥打场子的”.....	(141)
 第四章:上山下乡	(151)
“上山下乡再次激起了我的热情”:马笑冬的经历	(154)
“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154)
思茅.....	(164)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173)
当农民不用政审.....	(173)
“吃了吗?”	(179)
“女儿,女人,老人”.....	(181)
“七尺灰”.....	(185)
无形的墙.....	(188)
“歌唱动荡的青春”.....	(192)
 第五章:工农兵学员	(205)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208)
“新集体”—被削弱的神圣感—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218)
 第六章:新时期	(227)
叶维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229)
马笑冬:催生“潘晓”	(236)
 后 语	(247)

前言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这里面的。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

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代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2006年3月叶维丽（右）与马笑冬合影。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惑。“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杀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难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于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地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若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上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已看做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30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阶段。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

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作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有所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西方的妇女研究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1949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接续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

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革命是否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

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于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两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记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在每章前我都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版大同小异，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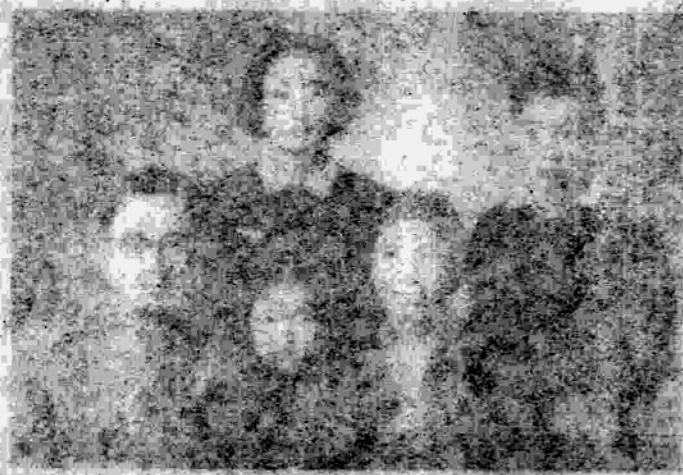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于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第一章

剪不断



★
不 興 潮



第一章：剪不断

9

有朋友问，你们为什么要从祖辈讲起？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做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小时候，我们对祖辈，即使有模糊的印象，也没有真切的感觉。他们是属于“旧社会”的，成分是“剥削阶级”，是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人物。而在我们的脑子里，“历史”只与共产党和新中国有关。1966年“文革”爆发后，叶维丽家仅存的爷爷奶奶的照片被销毁。祖辈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被彻底撕成了碎片。

对他们开始发生兴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对叶维丽来讲，越是学历史就越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马笑冬来讲，母亲的去世使她想弄清楚母亲不寻常的身世，了解未曾谋面、有些神秘的外祖父。因此，我们就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讲起。今天，有多少中国人在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把曾被打碎的历史重新粘连起来，畅销不衰的《老照片》丛书可以为证。

对我们两人来讲，这种寻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我们“参加了革命”的父母。他们作为出身“剥削阶级”的“少爷”和“小姐”，为什么选择了革命这条路？

这曾经不是问题。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曾使我们认为父母参加革命是天经地义的，而我们长大以后也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和世界，在“告别革命”的今天，这却成了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只能由我们来提出了。就像我们爷爷奶奶的世界对于我们曾经是十分遥远和陌生的一样，我们父母的革命生涯，他们经历的艰辛苦辣，对我们的孩子们、现在 20 多岁的一代年轻人来讲，也几乎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历史”又断裂了。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叶：1998 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 40 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们，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了骨血的联系。



叶维丽全家福。大约摄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这时从远处飘来哀怨的唢呐声，有一家人正按照传统方式出殡。60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愣。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的



修复后的西柏坡新华社旧址。（新华社稿）

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现在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算命先生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

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9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60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

叶：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当年“革命”对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

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家庭，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这句话，当年的那两个“小小少爷”——我父亲和我七伯伯——都记住了，很多年后他们俩分别回忆起来，居然脱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子的话，对她的骨气仍然赞叹不已。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



作者叶维丽之父与其兄弟们的合影。右一为作者父亲方实（叶笃成），右二为作者七伯伯叶笃正，右三为六伯伯叶方（叶笃廉），右四为五伯伯叶笃庄，右五为三伯伯叶笃义。

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

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